

焦循阮元评传 (上)

陈居渊 著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史评传丛书

爾嘉慶戊寅三月三日

學易叢言

凡十
入則

伏羲之卦有畫無辭文王周公

卦爻所之以觀象辭爻辭覺其奧澀不可解孔子作傳

伏羲之卦有畫無辭文王周公以辭指其畫之所之舍卦爻所之以觀象辭爻辭覺其奧澀不可解孔子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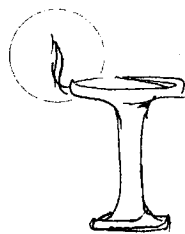
學易叢言
凡十
入則

爾嘉慶戊寅三月三日

余既成易學三書憶自壬戌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發錄而存之得一卷目之爲易話以其言質無深奧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焦循
阮元
评传
(上)

陈居渊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522页。



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241页。



况创造性地做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主义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



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做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厘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做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焦 循 评 传

序言 走出考据时代的努力： 乾嘉之际思想 与学术的转折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谈到“清学分裂的原因”，陈述了清代考据学发展至乾嘉时极盛之后，便直接进入了所谓道咸的分裂时期。按照梁启超的见解，造成清代考据学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本学派自身的问题，二是由当时环境的变化所促成。其中在阐明本学派自身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学派自身，既有缺点，而复行以专制，此破灭之兆矣。”这表明乾嘉学术由于自身的弊端与独断的学风，最终导致了在道咸间的彻底解体。随即梁启超又补充分析说：“盖清学经乾嘉全盛以后，恰如欧洲近世史初期，各国内部略奠定，不能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

命运,遂根本摇动,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①梁启超的这个观点,不能说是全无根据,但并不尽然。如他对乾嘉至道咸年间思想与学术变迁的判断,是不是过分简单化?是不是可用全盛——破灭来绝然分界?其中除了梁启超所谓的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之外,是否还存有一个上承乾嘉下启道咸学术的转换环节?如果有,那么这个转换环节在清学史上又当如何解释?对此,不仅梁启超本人没有提供出更为明确的答案,而且后来的清学史论者也鲜有专论。

就清代学术思想而言,人们习惯上把乾隆、嘉庆两朝崇尚汉代经典诠释的经学研究称作“考据学”或“汉学”;又以地域的特征区分为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然而对它们进行探索与评价时,论者较多的将目光投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对其内部的思想变化与学术创新却注意不多。从清代思想与学术演变的一般过程来看,每一次新的学术思想的转折,必然能在旧有的学术思想中找到它的萌芽。相对于乾隆时期的学术,嘉庆以后的经学研究,虽然不一定还浸渍于当时风靡学界的考据热,但是这股考据热浪,在十八世纪末期已显退潮端倪,学者们在重塑乾嘉汉学传统的努力中,对它曾提供的学术形象与价值取向有了新的感悟。他们在对先行者的总结与比较中能扬长避短,体现出异同交织的独特追求,从而孕育出新的变动,乾嘉汉学面临着自身求变更新的挑战,清代思想与学术出现了新的转折。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首先,重新认识清学的新源头。十八世纪前期,汉学研究的考据化,虽然是清初回归“元典”学术的继续与延伸,但是面对大量的需要重新辑佚、校勘、辨伪、整理的古代典籍,在“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研究思想的指导下,致使经典本身所蕴涵的义理价值反而不彰。乾隆后期,虽然经学著述如林,名家辈出,但是纯粹考证终使学术研究逐渐走入补苴缀拾的死胡同。考据不但遭到当时尊宋学者如姚鼐、方东树等人的抨击,在汉学家内部也出现了不满和检讨。乾嘉之际,一批以考据自期的汉学精英,无视朴学所自持的训诂考据方法的特有价值坐标,开始反思由清初顾炎武影响下形成的考据学,检讨考据学的学风、理论和研究方式。他们认为顾炎武不是清代学术的唯一源头,而是应该追溯到清初毛奇龄坚决反对程朱理学的方向。如焦循、阮元、凌廷堪等都一致表彰毛奇龄在清代考据学中的地位和实际影响,肯定他对清代学术的形成有着“通神智而开蒙塞”的启蒙之功,推崇他的学术为经学研究的范式,显示出乾嘉之际的学术研究正在走出纯考据的趋向。

其次,注意恢复经世致用之学。乾嘉之际,学者的学术活动虽然仍在前辈们考据学的框架内进行,但从学术思想史的立场看,一方面需要调整纯考据的学术研究方式,以适应更新学术的时代需要,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弥补考据学自身理论的种种缺陷。因此,为了表达自己的经学理念,提出新的经学理论,寻求新的研究方式,一些被考据家蔑视的理学经典与理论被再度重新论证。如焦循的《论语通释》、《性善解》、《格物解》,阮元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论语一贯说》、《大学格物说》,凌廷堪的《复礼论》、《好恶说》、《慎独



格物说》等,对宋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命题进行新的诠释。同时,他们重提义理出于典章制度,并将其提升到“得圣贤立言之旨,以正立身经世之法”的高度,激活了清初以来被考据家所淡化了的经术经世观念,弥补考据家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恢复经世致用之学。他们明确提出“以礼代理”,否定“理”的存在的合法性,希望通过人的行事与活动来协调纷至沓来而不易解决的人际关系,从而凸显出“礼”的道德意义,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现行社会伦理准则的失效,而且试图通过以礼代理的途径,寻求和确立孔孟行事原则,具有沟通、打破汉学与宋学壁垒的学术史意义,成为近代学术汉宋兼采的先行者。

再次,他们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治经思想,深化了经学研究的内涵并赋予评判通儒的标准。他们根据传统算学中所蕴涵的“实测”思想,认为与他们理解的“圣贤实践之道”相通不悖。焦循、汪莱、李锐、凌廷堪等人对中西算学的发掘、汲取与研究,并将其纳入经学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传统,纠正当时考据家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都能在中国传统科学中找到萌芽的“西学中源”说。另一方面,他们一再强调“实测”,则说明他们仍能较为理性地采取实事求是的通达态度对待西学,显示出较为开放的心态。既展示了他们对知识与价值,特别是对传统经学的重新审视,又体现了科学正逐渐走向儒学化的历史进程。

乾嘉之际,汉学思想的转折,也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变异和更新,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突破原有考据范围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并促进了经典诠释的多途取向。其表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存《十三经注疏》再作新的诠释。乾隆年间的学者因提倡汉学,对于唐人、宋人所作的经典诠释工作甚为不满。如汉学家邵晋涵的《尔雅正义》、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三部,大都遵循汉儒特别是郑玄的注释。乾嘉之际,新疏的编撰蔚然成风,呈现出新的特色。一是重视经典的义理发挥。如焦循的《孟子正义》,虽然自云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但是其特点却试图以易学的通变理论来诠释《孟子》,发挥自己的思想。二是还经典之真。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认为《诗序》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毛诗故训传》的作者毛亨之学源自子夏,是孔门正传。郑玄虽宗毛而为之笺,但其中间杂齐、鲁、韩三家诗义,并参以己意,已远离《毛诗》的旨趣。因此他将《郑笺》删去不用,以《毛诗序》代之,借此表示他修正郑注,还《毛诗》之真的原则。三是补郑注之不足。如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认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缺而无伪托。郑注以后便成绝学,而盛行的贾公彦疏“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唐代以后“其颠倒错乱于冥心空腹者之手,视他经尤酷”。因此广集前人对《仪礼》的校勘成果,对郑注补充、发挥。至于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则以声音贯穿训诂和据目验考释名物见长。上述新疏的编撰,尽管主观上确有呵护汉学的个人动机,但是客观上却更新了原有的注经模式,不仅为乾嘉之际经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从而导致了道咸以后的《论语正义》、《春秋公羊传义疏》、《左传旧注疏证》、《周礼正义》等新疏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经学由群经研究正转向专经的综合研究的新取向。

二、回归西汉今文经学。乾嘉之际,经学研究虽然仍崇尚以郑玄、许慎为代表的东汉古文经学,但已注意到以董仲



舒、何休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所包涵的义理价值。阮元不仅在为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所作序中追溯了公羊学的源流,重提公羊学大师何休与郑玄争论《左传》是非的旧案,甚至认为《公羊传》在阐发孔子精心发挥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方面要优于《左传》,而且还采纳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的建议,在《学海堂经解》中收入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刘逢禄的名著《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及《春秋左传考证》。焦循则对《公羊传》的“反经为权”理论作了易学的重释,而且将《周易》六十四卦中除《乾》、《坤》两卦外的六十二卦演绎成一个由洪荒之世、小人之世、更化之世、大同之世、天开治运之世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从易学的角度理解,显然是他的“旁通”、“相错”、“时行”,特别是“当位”、“失道”、“再当位”爻位运动法则的道德义理化诠释。然而在他强调“大一统”的复古循环论后面,正暗示了他已由原来的古文家立场转向探求今文家的微言大义。此外,如张惠言的易学研究,以虞翻为宗而求孟喜之义。又如凌曙、陈寿祺都从阮元问学,走的也都是“明训诂”、“详考证”的东汉古文经学的路子,但是他们对今文经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都从事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如凌曙的《公羊礼疏》与《公羊礼说》,以礼来疏解《公羊传》;陈寿祺则专辑西汉《今文尚书》及齐、鲁、韩《三家诗》遗说。然而他们并不属于常州公羊学派,章太炎说他们“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守一家以概六艺者,与常州家法绝殊;要之,皆吴派之变迁而已”。^①因此,从经学史的角度考察,

^① 《章太炎先生订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页。

